

学林

# 外交家伦敦观舞记

■ 王丁

1877年8月10日是一个星期五，周末前夜，大清驻伦敦公使郭嵩焘应伦敦一位贵夫人之邀，前往其家出席一场家庭社交舞会。使馆译员张德彝随行，回来把当晚的见闻写入日记，其中有关西洋社交舞会、交际舞的经纬记述非常详细，几有几千字的篇幅，其中以下的一段细节尤其珍罕：

光绪三年七月初二日，亥正，随郭星使同李湘浦乘车往赴伊补塞夫人家跳舞会。男女有数百人，看至子正回寓。按：英俗跳舞分为二等，有用请帖者，有卖票者……跳舞单及作乐单，有备有者。按：跳舞单，系一小花折，如册页，上系小铅笔，横印跳舞名目，每人一页，男女对约，同跳第几班，乃对书名姓，届时自来携手同舞。乐单则系厚纸一张，宽半尺，长八九寸，先印何会、某年月日，再则乐共若干节，每节作何乐。末印住址及某乐班。入者亦每人一张……其俗跳舞种类甚多，不习者不知其式，今姑记其名。如城中跳舞会所跳舞者，曰夏大力，曰蓝色尔，曰瓦拉自，曰扑拉喀。在乡间跳舞会，因地阔屋宽，又加当贝、扣的连及斯尔洛之尔得勾侯雷三种。至喀来兜年、麻租喀及御前夏大力等，皆非上等所取。《随使英记》

张德彝提到的舞曲名目，已引起音乐史专家的研究兴趣：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教授为了写作中国近代音乐史，广泛汇集史料，曾经对此节文字做了疏释（见《洋务人士笔下的西方音乐》）。他对(1)“瓦拉自”= 华尔兹、(2)“扑拉喀”= 波尔卡、(3)“麻租喀”= 玛祖卡这三种舞曲的考定，自然是颠扑不破。(4)“蓝色尔”的原语实为Lancers。张德彝统共列出十个舞名，剩下的其他六个待考的原语，我的补充解读方案如下：

(5)“夏大力”应该是Quadrille。这是一种方阵舞，由四对舞伴两两一组，四面各一组。这种社交舞19世纪流行于法国宫廷、贵族圈子，后传入英国。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种法英合璧本《舞艺：夏大力跳法指南》。陈先生提议的Canaries，在音韵上与夏大力有所不合。加纳利舞(Canary dance)是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舞蹈，盛行于16—17世纪，在莎剧里有体现。这在时代上过早，而且似乎也没有在19世纪社交舞中流行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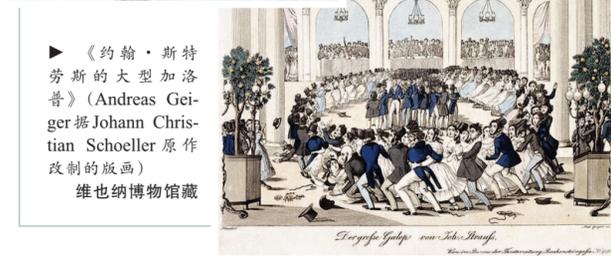
(6)“加当贝”，这个词的原型很久不得其解，翻阅过舞蹈、舞曲类的文献和19世纪书籍之后，我想起这也许就是社交舞会上非常流行常见的加洛普(Galop，义为“疾如跑马”)，是否张德彝本来译为“加罗贝”，传抄致误？

(7)“扣的连”，Cotillon的音译，也是起源于法国，传入英国后传往美洲的一种社交舞。作为一种方舞，它是夏大力的前身。这个词在汉文里有不少音译形式：科替雅、高替洋、珂退洛、科奇里翁舞(《汉语外来词词典》，刘正培等编，1984)，从音值特征看，上述四个译名应该来自法语cotillon的发音。

(8)“斯尔洛之尔得勾侯雷”，就是英国“乡村舞”的名曲“Sir Roger de Coverley”。这个曲名比较长，音节多，



《舞艺：夏大力跳法指南》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约翰·斯特劳斯的大型加洛普》(Andreas Geiger据Johann Christian Schoeller原作改制的版画)  
维也纳博物馆藏

实不易考得。感谢舞蹈专家熊力垂告正解。陆谷孙《英汉大词典》(2007年第二版)收录：“Sir Roger de Coverley柯弗利(英国18世纪作家J. Addison和R. Steele主办的《旁观者》杂志上刊文章中虚构人物，为18世纪理想化乡绅的典型)。”

(9)“喀来兜年”，即Caledonian。这是苏格兰的一种乡间舞蹈。喀里多尼亚指现今大不列颠岛上苏格兰地区。在现代英语里，喀里多尼亚也常被用作苏格兰的代称，是个带有一层古旧色彩的老词。

(10)“御前夏大力”，Stately Quadrille也比较费解，它是一个语义语音合璧译名，夏大力已见于上文。“御前”一词其实不当，是因为张德彝不知道帝制、君主制的imperial、royal和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区别，笼统地沿用了封建词汇，属于“时代局限”。四方对舞而又加上stately“国家之间”的修饰，确有近代风范，语含戏谑意味，影射的是多国之间外交的纵横连横。如此顾名思义，这种舞就是一种扩大版的夏大力。

郭嵩焘的继任者、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在出使日记中，记录过在英国白金汉宫(“北京邸官邸”)宫廷舞会中的一些特点：

官殿跳舞，皇家眷属与各国公使、署中男女同在厅之上段，英之士绅在厅之下段，鞠躬而相约，合偶而跳舞，乐之音节，跳之步履，亦与寻常跳舞无异。太子妃所与舞者：二世子、三世子、俄国世子之属。太子所与舞者：皆世爵家命妇、闺秀。若数偶合跳之舞，则各国公使暨世爵命妇亦往僮焉。太子、诸王妃、公主、郡主虽仪态庄严，神情矜贵，然于跳舞之际，徒倚回风，飘飘云集，则无以异于恒人也。(《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曾纪泽的着眼点是太子、太子妃，一男一女对舞的两类舞伴如何匹配。

他提及的“数偶合跳之舞”，可能就包括“御前夏大力”这一类的合群起舞，各国公使、公使夫人参与其间，不正是活脱脱的一幅国外外交舞会图景吗？曾纪泽外交，后世有“折冲樽俎山河”之誉，但他不跳舞，“旁观者是否对舞伴间的分合趋避会有会于心呢？”

曾纪泽看到了“上等人”在舞会上的矜持自重，但对太子、公主们在起舞之际“无以异于常人”的常理常情，倒是看得明白。张德彝写道，有一些舞种“非上等所取”，想必是从西洋外交官口中听来，非他杜撰，但实际上未必一定。深晓维多利亚时期风俗制度的狄更斯曾经说过，“低俗的那些乡下舞，早就被严厉查禁过了”(《老古玩店》)。张德彝提到的三种“上等”的舞，可以引用1868年英国王室侍卫官办事处举办的常规舞会节目单作为反证：英国王室侍卫官舞会就以“夏大力欢聚会”为名，曲目凡26，晚上九点钟开始。赴会的妇女，手持一张“跳舞单”是不方便的，此处一把装饰性的扇子就派上了实际的用场。



社交舞蹈是小说里的常客。巴尔扎克在1835年完成出版的小说《高老头》写到了“夏大力”舞，傅雷先生译为“四组舞”：

在拉斯蒂涅心目中，阿娜斯塔齐德雷斯托夫人就是一个迷人的女子。他想法在扇子上登记了两次，并且在第一次四组舞时就有机会(展开攻势)。

没有一组四组舞没有她，旁的女人也都气坏了。

《高老头》的张冠尧译本后出，沿用了傅译“四组舞”。

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也经常写交际舞，quadrille这个舞名多次出现，李健吾先生译为“对舞”。Cotillon也见于《包法利夫人》，李译“花色舞”。存心勾搭爱玛的医生鲁道尔夫，兀自私付“她一定闷居无聊！一定愿意住到城



▲ 1887年1月11日某位女性舞会参加者的舞扇，扇根部分印有当晚所有曲目，手写部分填写约定舞伴的名字。

里，每天夜晚跳波兰舞！小可怜儿！”，“波兰舞”译polka(波尔卡)。在这些洋名词上，李健吾的处理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没有用音译，包括相当普及的Waltz/Valse华尔兹、圆舞，《包法利夫人》屡见，李译“回旋舞”。这明显是一种反潮流的作法。

狄更斯——跟张德彝记录的维多利亚时代全盛时期的社交舞会文化同时同地的作家，在作品中交际舞也少不了要写到。前文提到的Sir Roger de Coverley，据说是狄更斯格外喜欢的一个舞种：“狄更斯是一位老成持重的智者，在私下场合一如他的作品，言谈和蔼，容易接近。他有一些自己的特殊爱好，像竞争性强的游戏、长时间散步，他还特别爱跳柯弗利舞(一种舞)。(R.H.Home)柯弗利舞，有一种狄更斯式跳法(见他女儿Mamie《对父亲的亲切回忆》，1896)，狄更斯甚至还把它写到了作品里：《圣诞歌》第二回，故事的主人公罗伯特的昔日老板费兹威格为劳碌了一年的下属和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坊办了一场圣诞晚会，除了预备丰盛吃足喝，还特地安排晚会最后以这支欢快的、挤挤挨挨的群舞结束，大腹便便的费氏夫妇主跳，热闹、温暖的情景，令昔日的学生、今日的资本家司库池开始对人

情味有了感触。

《圣诞歌》不仅在全世界名列最红的圣诞文学之列，在中国也有多个译本。吴均陶2019年的译文之前，有汪涇然译《圣诞歌》，张竞生译《怪人梦》。

在吴译前正好一个世纪的1919年，闻有便以笔名“闻野鹤”，与王仲群合作翻译此书，题名《鬼史》出版，此后该书未再版过，现在已非常罕见。译文使用文言。核查原文，对照其他现代语体文翻译，闻译显得甚不忠实。狄更斯花了大功夫渲染的这场圣诞晚会场景，在这个译文里大幅缩水，狄更斯特别安排的舞会终曲曲名全不见了踪影。这也难怪一百年前的译者，当年十八岁的华亭文学青年闻野鹤——后来成为文史研究学者的闻有，面对狄更斯这一大段既有技术化的舞蹈术语、笔调又打趣的文字描写，只能徒唤奈何，疯狂删节，既添枝加叶，又删繁避难，如此上管齐下，译文跟原文基本就对不上了。昔非今比，如今时代有上网之便，可以搜阅Sir Roger de Coverley舞的丰富视频资料，有音乐，有化妆，甚至有教学课视频，讲透办法，可以step by step学起来，张德彝舞名单的所有名目都可以一招一式地循名责实，一一找到，复古风的，现代派的，都应有尽有。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巴利安」 墨西哥曾经的 中国市场

■ 于施洋

智利诗人聂鲁达曾回忆：我整年从市场到市场，因为墨西哥就存在于市场之上。而现在我们知道，墨西哥五彩缤纷的贸易传统中还曾经有过中国源流。

在国外，华人华侨聚居的地方往往被称作“唐人街”(Chinatown)，这个音义兼备的称呼是从19世纪北美流传下来的，即几乎同一时期西语国家的“中国城”(Barrio Chino)。不过，如果我们提“巴利安”(Parían)，那将会是另一个故事——这个从他加禄语来的“中国市场”16世纪末在马拉加形成，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被用来称呼墨西哥城中心的一片高端商场，是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的最佳证明，也是两百五十余年中国货物在美洲扩散的中枢。

巴利安是墨西哥城中心广场西南角一个巨大的市场，1695—1703年间建成，以“中国船”运抵墨西哥的中国丝绸、瓷器、家具等精美商品闻名，墨西哥独立战争之后开始衰落，1843年被拆除。

墨西哥城中心的市场也便于效仿。一方面，不少华人曾经登上大帆船前来谋生，在墨城形成了华商行会(不过，该时期的“华人”一词chino也可以泛指亚洲人)，另一方面，马拉加巴利安一直很受西班牙人青睐，1590年马拉加首任主教萨拉萨尔写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呈文中就有体现，其“百业皆备，居住市内的华侨，皆有业栖身，无一游手偷闲之人。他们所造物品，间有胜过西班牙运来者，塑像亦佳，全岛各地的教堂所供奉的神像，皆出诸华人之手……市中有饭店多家，华人、土人皆集于此，即西班牙人亦常来买醉。”

可以看到，墨西哥在把“巴利安”这个概念拿来的过程中，“华人社区”及“隔离”“防范”的意涵明显降低，转而充满了通过菲律宾站在中国大门的想象：墨西哥不能全数生产西班牙殖民统治所需的产品，又受限制不能与其他美洲地区或欧洲国家贸易，但至少有一个壮观丰盛的广场，提供新奇优质的舶来品，带来置身“东方”的异域感(地理上位于墨西哥西方)，以及大帆船贸易航线为我所用的成就感。

墨城巴利安的繁荣景象持续了一百多年，中间还进行过数次修缮，直到1810年墨西哥宣布独立，1815年大帆船停航，1828年再遭起义者洗劫，经过激烈的公共讨论之后，在1843年的两天之间被夷为平地。

拆除之后，巴利安逐渐从墨西哥城的记忆中淡去，很多当地居民都无从得知，但与中国贸易息息相关的几处城市——大帆船航线终点阿卡普尔科、转运货物并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窑业中心普埃布拉，都保留了这样的空间并冠以“巴利安”之名，直到今天仍在扮演小商品市场的角色。著名智利诗人聂鲁达曾回忆：我整年从市场到市场，因为墨西哥就存在于市场之上。而现在我们知道，墨西哥五彩缤纷的贸易传统中还曾经有过中国源流，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通过各种精美货物包括外来面孔刺激着墨西哥对东方的想象。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拉美历史印记，是墨西哥与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友谊缘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西葡意语系)



▲ 比利亚潘多(Cristóbal de Villapando)《墨西哥城大广场一瞥》，约1695年  
英国威尔特郡科舍姆院艺术馆藏

# 少女板仓栖子的书法与人生

■ 张天琪

这是一件在市场上无人问津的日本汉字书法条幅。它笔法稚拙，纸裱简陋，不但遭逢水祸，还曾有虫虫穿过——所有廉价字画的特征都在此聚首，我只花了28元就把它买到。或许，这亲民的价格不全因为品相，还要归功于书者仅是一位元人年八岁的少女。

条幅款识云“乙亥一月试笔 八岁板仓栖”，再加上彼时的装裱，可知书于1875年。书者姓板仓，名栖，两方名章分别为“板仓”“栖女史”。显然，书者是一位小女板。把字卷起来，还能看到装裱的包首处有“花草女书”四字。书幅所示，则是元人马臻的两句诗：“南屏山色染春烟，路接高峰鼓社喧。”

板仓栖年仅八岁就有多方印章，譬如，引首处就钤有一方闲章“山容水态”。她年岁稚嫩，却已能写一手汉字书法，识语也颇见老成。可见，她并非普通人家的小孩，应当是出自崇尚汉学的日本上流家庭。当我把“板仓栖”“女”“花草”三个关键词去搜索引擎，真发现有，只是结果让人既惊喜又心伤。惊喜的是她的家庭和教育背景都有迹可循；心伤的是知道她19岁就死了。

板仓栖全名板仓栖子，号花草。在进见学园女子大学“花溪纪念馆资料馆”的某次展览中，有一件晚清驻日公使张斯桂的诗稿，赠给“板仓君次女公子花溪先赠何如璋七绝一首以叙两国文化渊源：‘鲁英米佛来虽久，何若同文贵国亲？’何氏则答以‘鲁邦风雅接东邻’，积极回应进见氏‘同文’之说。此后，与进见者各逞其能，善诗者赋诗，善书者挥毫，驻日随员沈文茨、何定求，同席朝

1月8日，该校正式开学，是日本近代女性教育的里程碑，而栖子于次年写成的那件试笔书法，侥幸存世，也算得上她个人人生的里程碑。稍后的4月10日，进见花溪于日记中提到板仓胜达的仆人送来板仓信子之妹的入学申请，申请者即栖子，板仓胜达正是两姐妹之父。

板仓胜达本是一方诸侯，为福岛藩末代藩主，明治维新后与其他藩主被剥夺了权力，但他们仍被视为政权平稳过渡的功臣，纷纷在新政府任职，继续享有人间荣华富贵。栖子作为次女降生其家，算得上天赐好运，比为生计奔忙的黎民黔首要强过百倍。

进见学校初成时仅接收名门之女，规模在百人以下，性质近于私塾，校长进见花溪躬亲从教。学生在此受业，往往从校长名中取“花”字，另拟别号，栖子的“花草”之名即由此而来。进见花溪长于南宗画(此派为中国传统绘画分支)，亲近汉学，对这两种特别重视。栖子有《初夏即事》诗言及校园生活，诗云：“新窗矗矗映窗纱，日课方终日诗斜。闲闲庭园吟且步，蔷薇又放数枝花。”(《日本国媛吟藻》，1880)。这也是栖子唯一存世的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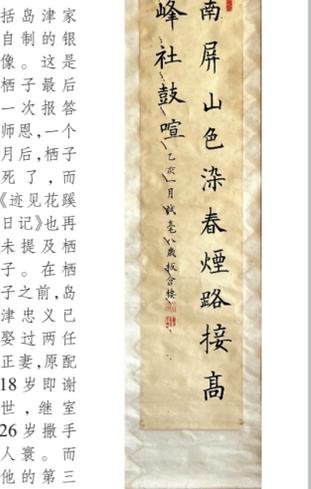
1878年仲夏与何如璋的那次会面，由于双方语言不通，只好以汉字为媒介纸上交流。雅会以诗歌唱和为始，进见花溪先赠何如璋七绝一首以叙两国文化渊源：“鲁英米佛来虽久，何若同文贵国亲？”何氏则答以“鲁邦风雅接东邻”，积极回应进见氏“同文”之说。此后，与进见者各逞其能，善诗者赋诗，善书者挥毫，驻日随员沈文茨、何定求，同席朝

鲜人李基永、金绣秀等皆有所作。不过，这些高官文并非此会主角，反而是六名小才女成为耀眼明星，她们在众人面前舞文弄墨，引来称赞连连。

文艺傍身的栖子也曾于会上临席献技，其风采由《形管生辉帖》中清国公使的评论可窥一二。何如璋云：“花草女史受业于进见氏，聪颖绝伦，下笔惊绝。昔桓夫人贵品称‘快马入阵’，而卫氏之‘管管格’艳称千古，皆艺苑盛事也，若女史者近之矣。”前及张斯桂的诗稿也见于此书，题为《四明张斯桂书赠板仓君次女公子》，其小序称栖子“书法颇佳，大小咸宜”，诗云：“拙笔临写卫夫人，妙格管管字新。藕臂轻舒葱指运，一条钗股一钩银。”被比作古代两位女性书法名手桓夫人、卫夫人或许是栖子一生所获最高褒奖。何、张二人所言虽不免客套，但异域少女能亲汉文化已足令人称奇。

我们无从知悉此后数年栖子的生活，现存《进见花溪日记》再度提及栖子已是1885年的10月4日。这天进见花溪收到栖子的信和礼物，而栖子也有了新的称谓：“岛津妻子君、寄书及织锦来。”这意味着板仓家的栖子成了岛津家的妻子。她的丈夫岛津忠义也出身名门，为萨摩藩末代藩主，后任鹿儿岛县令。尽管其在政治上上一生庸碌，但终究是地方长官，荣光尚在。

1886年4月9日，进见花溪又收到栖子的礼物：“岛津夫人花草、寄书、及织锦工物、并岛津家制作之银刀大名年知、少名彦名二神体至。皆花草君之所赠也。”此次的礼物较前次更为丰厚，包



括岛津家自制的银像。这是栖子最后一次报答师恩，一个月后，栖子死了，而《进见花溪日记》也未提及栖子。在栖子之前，岛津忠义已娶过两任正妻，原配18岁即谢世，继室26岁撒手人寰。而他的第三任妻子栖子也死于19岁。岛津忠义此后未再娶。可是，与三位正室命运截然不同的，是岛津氏的两位侧室均享寿长久。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第582期